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欄目主持人語(胡朋誌〔紹興文理學院外國語學院院長、教授、博士〕):

「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是當前中國發展的戰略所需,也是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的現實所需。為推動國家戰略目標的實現,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我們需從理論研究、國際傳播實踐、語言教學等多方面做出努力。本專欄包含四篇論文,首篇以理論分析為主,討論了當代中國視域下中國國際傳播的意識更新與敘事轉向問題;其餘三篇關注實踐,分別從大學英語教學、中學英語教學、國際中文教學三個方面討論了大學生、中學生、國際中文學習者學習和表達當代中國國情及中國文化的現狀,思考其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實踐方法和改進方向。本專欄論文作者既有理論研究者,更有從事外語教學和國際中文教學的教師和志願者,通過各自的思考和實踐,希望共同推進「可信、可愛、可敬」中國形象的塑造與國際傳播。

The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Mindset Update and Narrative Shift

¹ZHOU Yuhua ²HU Pengzhi

¹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China

²Shaoxing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une 3, 2024

Accepted: July 10, 2024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ZHOU Yuhua & HU Pengzhi. (2024). The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Mindset Update and Narrative Shift.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3), 009–015,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3.002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3.002>

Abstract: “Contemporary China” is a place of openness, connectivity, and innovation, with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s its main fe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iness,” disseminating contemporary Chin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s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hina can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construct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open up a new patter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nd mutual benefit in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mutual learning and win-win cooperation among civilizations. The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should adopt targeted narratives, prospective narratives, and shared narratives to promote communication on demand and two-way interaction, by which it will actively contribute experience and wisdom to world development while accommodating the diversity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world.

Keywords: Contemporariness; Contemporary China; the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ZHOU Yuhua, female, born in July 1980, a native of Shanghai, Master of Art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t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whose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HU Pengzhi, male, born in July 1980, a native of Chaohu, Anhui Province, Doctor of Philosophy, professor, and master's supervisor in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Shaoxing University, whose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teaching.

傳播當代中國：意識更新與敘事轉向

¹周玉華 ²胡朋志

¹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²紹興文理學院

摘要：「當代中國」是開放、融通、創新之地，其核心內涵是「中國式現代化」。在「當代性」視域下，傳播當代中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國際傳播為手段，中國能夠更加積極地參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構建，開拓和合共生、美美與共的人類社會發展新格局，實現文明互鑒和合作共贏。傳播當代中國應該採用定向敘事、前瞻敘事和共用敘事，推動傳播按需進行、雙向互動，在積極為人類社會發展貢獻經驗和智慧的同时包容世界的多元與矛盾。

關鍵詞：當代性；當代中國；傳播當代中國；中國式現代化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全人類共同價值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大理念研究」(專案號 23ZDA127)

2021年5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再次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為落實這些重要任務，社會各界紛紛提出了各自建議，核心內容包括構建中國話語體系、拓展對外傳播路徑、提升國際傳播效能等。本文回到一個更基礎的問題：什麼是「當代中國」？希望通過對「當代性」和「當代中國」的解讀，思考當前我國國際傳播的認識思路和敘事方向。

一、「當代性」與「當代中國」

「西方理論中的『當代性』不是單純時間性的，它有更加複雜的多維度哲學內涵。」據考證，西方語言中的「modern」及類似表達源於西元4世紀時的拉丁語「modernus」，其詞根為「modo」，意為「今天」「當前」「現在」，當時被用來表述基督教化的羅馬帝國，以區別於早期羅馬以及羅馬帝國建立之前的異教徒時代。從這一最早的使用中，「現代」就被賦予了一種區別「古代」或者告別「過去」的內涵。「現代性謀求與過去的決裂，並將這種決裂作為自己的起點。」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工業革命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之後，西方對「現代」的認識發生了根本轉變，但「決裂」作為「現代性」的特徵卻被保留了下來，進一步造成了「傳統與現代之間抽象的對立」。即便「現代性之殤」在諸多領域已經出現，但因為「現代性」帶給了西方太多的繁華和榮耀，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仍堅守著此概念，寧願使用「後現代」一詞，也不願意走向「當代性」。以「決裂」為武器，他們希望堅持古今、中西之嚴格劃分來保持自己在歷史、文化乃至經濟發展、社會制度上的優越感。

「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正確理解「當代性」我們需要走出西方對「現代性」的迷戀和因此造成的歷史割裂。《西方文論關鍵字》中對「當代性」有一段精彩且深刻的解讀:「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當代性具有其他任何性質無可比擬的優先性。不是歷史優先於當代,不是未來高出於當代,恰恰相反,當代使歷史成為真理,當代使未來成為現實。因此當代性總是優先考慮現實性、真理性。只有當代性才具有能動的知識描述,一切知識的描述都需要通過當代性得到重新描述,得到重新評估。」所以,「當代性」是歷史與文明的延續,是相容並蓄的時代綜合體。

「當代中國」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直接成果,在兩個方面不同於西方。第一,「當代中國」借鑒了西方的發展成果但創造了人類文明的新形態。中國是在西方國家的堅船利炮之下才真正開啟了自己的現代化歷程,其後從「洋務運動」開始,歷經「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中國人民不斷學習西方,一路摸索前行,但均以失敗告終。最後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直至「改革開放」,中國最終才找到實現現代化的自主道路。第二,「當代中國」兼顧了歷史但實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中華文明 5000 年延綿不絕,這正是因為我們沒有因循守舊、故步自封。習近平指出,「創新性發展,就是要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新進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正是這樣一次次的創新與轉化,我們才得以破解中國現代化發展道路上的眾多難題,構建了不同於西方的當代中國文明發展新路徑。當前中國已經全面邁進了新時代,新時代需要新的認識、新的理論,也需要新的話語體系,這也要求我們努力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二、傳播當代中國中的意識更新

(一) 傳播就是建設

「當代性」有兩個重要特徵:一是統一性,古今交匯、中外融通;二是發展性,謀求進步、面向未來。著名歷史學家克羅齊認為,「我們認證了當代性不是某一類歷史的特徵,而是一切歷史的內在特徵之後,我們就當把歷史跟生活的關係看作一種統一的關係。」統一性構成了發展的基礎,以「統一」理念和「發展」史觀為基礎,「當代性」就是與時代同行,個體與社會均需發展中自我塑造,一切都是未定的,也是前瞻的。所以,當代性是當代人的奮鬥域場,當代人可以介入現場、形塑潮流、促進對話,參與當代性的構建。

我們應該意識到,國際傳播不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補充,傳播當代中國本身就是建設當代中國。國際傳播不應該滯後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歷史已經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是一個全新的歷程,它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實現道路,也不是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化運用的結果。以中國式現代化為核心,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彰顯的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之下的民族實踐自覺和內在性探索。作為探索的階段性成果,中國式現代化包含一系列不同於西方的思想理念、發展模式、價值觀念,我們必須積極構建與此相適應的中國國際形象,減少世界對我們誤解。中國式現代化不同於西方,但推動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傳播當代中國就是去總結這些成就,構建自己的話語,表達自己的想法,增加世界對人類社會發展道路和現代化進程多樣性的理解,從而也可以堅定廣大發展中國家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勇氣和信心,推動世界的發展。傳播當代中國必須根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深入建設實踐、參與建設過程、總結建設經驗、提煉建設成果、構建成果描述話語,這些無疑都是建設實踐的一部分,也都是傳播當代中國的必然要求。不僅如此,傳播當代中國的實踐意義還在於,積極、有效的對外傳播可以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從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創造更好的國際環境。

（二）傳播推動發展

現代性是一種界定和自我確認，當代性則代表著對當下的自信和對未來的展望。「現代性與同質思維或同一思維聯繫在一起，當代性則以異質思維或他性思維為其特徵。」西方人以現代化的先行者自居，他們只認可一種現代性，那就是西方的現代性，在他們看來，人類歷史的發展不過是時間上的延續，西方已經在時間之軸上取得了領先，其他國家、地區唯有跟隨、仿效才能推進各自的現代化進程。福柯對此進行了最為深入的反思，他認為西方世界是固化的世界，「我們處在這樣一個時刻：我相信這個世界當此之時更多地被證明為不是一個歷經時間而發展的偉大生命，而是一個把點連接起來，把線交織起來的網路。」中國式現代化展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另一條道路，包容了中國的過去，展示著中國的現在，也指向中國的未來。

西方現代性強調與過去的切割，並且在工業革命、科技革命的加持下追求現代性的普世與永恆。受西方的嚴重影響，我們也被困在了古今劃分的時間維度之中。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傳統文化」都是中國國際傳播內容上的絕對主體，我們驕傲於自己的過去，希望通過對自己過往輝煌的講述來塑造中國文明古國的國際形象。走出時間維度上的束縛，傳播當代中國要以推動中國與世界的發展為導向，勇於向世界描繪中國對未來的設想與規劃。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在於發展。中國式現代化帶來的發展和成就鑄就了「當代中國」作為世界發展主體的存在論基礎，展示了人類社會多元發展的可能。傳播當代中國就是要向世界講好中國發展的故事，邀請世界各國人民一起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如此才能幫助更多國家儘早走出西方的「現代性之殤」，開拓多元共生、美美與共的人類社會發展新格局。

（三）傳播促成共贏

「如何看待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生活方式之間的關係，是國際傳播的基礎問題，決定著國際傳播的底層邏輯。」西方世界的國際傳播因其殖民需要而生，也一直服務於其殖民掠奪、宗教傳播、資本擴張活動，如施密特所言，「400 多年來，從 16 世紀一直到 20 世紀，歐洲國際法的框架都取決於一個特殊的歷史進程：侵佔新世界。」西方國家國際傳播的主旨也可概括為「傳播是侵佔」和「傳播是干涉」。

傳播當代中國，就是要擺脫西方式的單向傳播和霸權敘事。2023 年 3 月 15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議」，他提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在此之前，中國分別於 2021 年、2022 年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三大倡議表明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對自身的發展定位，中國尋求建立一個和平、開放、包容和共用的世界。中國國際傳播的目標是實現共贏。國際傳播在西方是國際掠奪和控制的手段，在中國則是加強國際合作、實現共同發展的路徑。「全球文明倡議」宣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加強國際合作，強調不要將各自的價值觀和發展模式強加於人。世界文明多樣，發展路徑不一，但人類文明仍有共通之處，需要通過交流、互鑒互通有無。傳播當代中國，不是單向言說，不是要將中國的發展觀念、模式強加於人，而是希望將中國的經驗、成果和世界共用，期待形成世界範圍內在人類社會發展上的雙向互動。傳播當代中國，我們以平等、對話、包容為基本原則，通過國際傳播，我們同時希望讓中國的經驗、成果在更大的範圍內接受檢驗。

三、傳播當代中國的敘事轉向

（一）定向敘事，按需傳播

「當代性」強調多元統一、差異共存，「當代性具有把一切不平等、不相同、不合適、不般配、不同步的世界

擠捏在一起的特性……在這個意義上，當代性具有一種統合功能，即把異質的一切都統合到一個『共同』中來，統合到『共存』中來。」所以，「當代性」是「多樣性」和「歧義性」的統一，每個國家因其歷史與現實各不相同，其「當代性」的形態和結果也就不會相同，對其傳播當代中國就應該有所側重，有所取捨。

定向敘事，就是敘事的對象有針對性，敘事的內容有選擇性。對於西方國家的傳播沒有必要以政治理念、法制政策、價值觀為主要內容，我們可以定向輸出中國的特色文化、現實生活、未來願景等。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社會經濟發展是第一要務，他們很多都經歷了因為學習西方發展模式而帶來的慘痛教訓，所以非常期待瞭解中國在發展道路、政策舉措以及社會管理方面的經驗。對於這些國家而言，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經驗正是他們所需。

定向敘事、按需傳播意味著中國的國際傳播要所有為，有所不為。傳播當代中國，不意味著要完整傳播中國、完美傳播中國，也不意味著要急於傳播、要向所有國家傳播。傳播當代中國的底氣是當代中國的發展現狀，底色是開放、自信、包容，我們要允許別人對我們有誤解，也要寬容別人對我們傳播內容的拒絕。向西方人傳播「中國式現代化」，因為發展方式和發展階段上的差異，其接受難度要遠大於向發展中國家傳播。講述中國發展的故事，傳播「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廣大發展中國家才是更好的聽眾。基於相似的基礎、相似的訴求，我們和發展中國家具有更多的共通之處，更容易相互交流經驗、分享成果，這樣也更利於共同話語體系的構建。

（二）前瞻敘事，建構傳播

傳播當代中國，就是要在世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向世界講述人類文明新形態，描繪人類發展的未來圖景。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在西方世界收穫大量擁躉，究其原因，最核心的要素在於這些論點符合西方世界的心理期待。西方人歷經現代發展數百年，盡享現代化帶來的繁華與心理優越感，他們不願走出現代化的舒適區，不願看到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出現。對於中國文明，他們則帶著一貫的質疑。伯特蘭·羅素百年前就曾對中國文明的發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當時西方文明已全面侵入中國，中國文明不斷被否定，羅素追問，東西方文明在中國接觸「能否產生比兩個母體文明都要優異的新文明，或者說這種接觸只會摧毀本土文化，代之以美國文化。」當代中國展示的正是一種走出傳統又超越西方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傳播當代中國，就是要基於中國式現代化的成果，以前瞻的視角來敘述中國對人類發展的設想，回答西方不願直面的問題。首先，人類文明之間的差異必然會導致衝突嗎？如果以西方式現代化為範本，回答只能是肯定的，因為西方式現代化將自己的道路、模式、價值冠以「普世」之名施之於天下，不容差異，不容改變。如此也才有了「衝突論」之說。當代中國則提倡「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相信人類有智慧、有能力在保持各自獨特性的同時，為了人類發展與繁榮的共同目標，結成命運共同體，一起應對全球性挑戰。其次，歷史會終結於西方模式嗎？弗朗西斯·福山認為西方的民主理想及其體制是人類發展的歷史終點，西方人曾經因為蘇聯的解體而歡欣雀躍，似乎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瓦解，西方民主的勝利指日可待。但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卻為世界樹立了另一個樣板，表明走出西方模式完全可行。中國的示範效應為深陷西方模式之困局的眾多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希望，他們需要審視自己的歷史與當下，重新規劃自己的未來。

傳播當代中國，我們就必須主動承擔起為世界構建交流平臺的責任。當前世界經濟下行，新冠疫情之後世界單邊主義、民族主義、保守主義再度盛行，各文明主體、國家主體之間交流愈發困難。但交流必須繼續，唯有交流才能超越隔閡，唯有互鑒才能超越衝突。建構新的平臺不以追尋統一範式、統一結果為目標，可以聚焦各國的發展訴求，從交流中國經驗、表達中國意見、提出中國想法開始，在傳播與溝通中凝聚人類發展共識，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探尋可為全人類共用的共同價值所在。新建構的交流平臺可



以形式多樣,如我們主辦的國際賽事、國際論壇,我們發起或者參與發起的世界性組織,我們提出的世界性倡議,如此等等,皆可充分利用。我們甚至還可以構建「臨時性文化共同體」,不追求「文化形式、文化規範和文化價值的永續認同,而是基於一種共有的經驗性文化現象,在具象化的『共同體』敘事引導下形成一種表層共用性和深層共通性有機統一的文化共識。」只有交流暢通,真實、立體、全面之當代中國才可能被認識,當代中國話語才可能逐步建立,中國模式、中國道路才可能被逐步接受。

(三) 共用敘事,互動傳播

共用是人類社會和諧發展的前提。對於傳播當代中國而言,共用敘事不僅是講述中國的世界故事,更是講述世界的中國故事,不是去簡單宣揚中國眼中的世界,而是更加重視發現和解讀人類命運共同體中世界視域下的中國,講述中華文明、中國發展對世界的貢獻。共用敘事不是單向講故事,而是雙向交流,要求在國際傳播過程中表達自己、傾聽回饋、尋求理解、建構共識。共用敘事的核心是互動,講述與聆聽互動,傳播與回饋互動,求同與存異互動。互動過程中不設定明確的他者視角,各方皆可為「自我」,也皆可為「他者」,有時還可以因實際交流和現實發展所需,設定共同自我或共同他者,以便凝心聚力、集思廣益,應對共同的挑戰。

傳播當代中國,就要認識到中國式現代化本就是「中國在與世界交織互動中開創出來的,也會進一步推動中國與世界的交織互動。」中國式現代化雖以「中國」冠名,但它卻幫助創造了多元共贏的文明新形態。這一文明新形態以「共商、共建、共用」為行事原則,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為存在方式,以民本主義、多邊主義為發展路徑,以美美與共、世界大同為最高理想。傳播當代中國,要認識到國際傳播本身就是一個共用共建的事業。傳播當代中國既是在傳播中國做法、構建中國形象,也是在主動驗證中國經驗,希望通過國際受眾的互動和回饋來發現問題,不斷改進。

共用敘事、互動傳播有助於解決幾個中國國際傳播過程中長期困擾我們的問題:印象刻板、認知偏差、情感失真。印象刻板指因中國近現代以來的落後給世界(主要是西方)造成的固定印象,這些印象在西方的宣傳中被不斷加強,以致造成在認識中國時會先入為主,對沖和抵消我們傳播當代中國的努力。認知偏差指因為背景資訊和認知方式上的不同而造成的理解與接受差異,我們認為中國式現代化是建設成果,在別人看來,卻可能構成了我們對他國的威脅。情感失真指因為缺乏對華直接體驗而造成的情感缺失,表現為對不熟悉的中國風土人情、社會習俗等心生厭惡。這三類問題真實存在,我們在傳播當代中國時切不可回避,否則自說自話式的傳播只會加深誤解,效果適得其反。減少誤解、推動有效傳播最好的辦法就是形成互動、推動共用。傳播當代中國要以全球問題為導向,從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踐經驗出發回應各國共同焦慮。基於共同焦慮才會生成相似的情感,引發相似的關注,為傳播構建共同的認識基礎和情感基礎。這樣的全球問題有很多,如生態、資源、疾病、恐怖主義等等。傳播當代中國可以圍繞這些問題,分享中國式現代化歷程中的經驗與教訓,最大程度構建認識共同體,並以認識共同體為基礎構建命運共同體。

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的,我們在傳播當代中國時不要刻意迎合、委曲求全。真正的共識一定是建立在「主主平等,和合普惠」的理念之上,一定需要在實踐中協同合作、共商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人為整合的集團,更不是因為意識形態輸出和國際政治鬥爭需要而建立的臨時組織;相反,它一定是多數國家和大部分人類個體依據各自認識與體驗形成的發展共識。迎合與委曲求全只能贏得一時的和解,無法得到必要的尊重,更無助於真正共識的形成。傳播當代中國,要從一廂情願走向兩情相悅,即便過程中面臨著印象刻板、認知偏差和情感失真等等挑戰,我們也決不能為圖一時之快而放棄原則,對發達國家曲意迎合,對發展中國家強言說教。我們相信,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讓中國具有了更大的歷史定力,求同存異和合共生,當代中國可以在堅持自身獨特性的同時接納世界的多樣性,也會在積極為人類社會發展貢獻經驗和智慧的

同時包容世界各國之間的差異和矛盾。

參考文獻

- ① Carl Schmitt. (2006) *The Nomos of the Earth*. New York: Telos Press Publishing.
- ② Krishan Kumar. (1995) *From Post-Industrial to Post-Modern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 ③ Jurgen Habermas. (1979) Modernity — An incomplete project. In Paul Rabinow and William Sullivan (eds.),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A Second Loo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42–143.
- ④ 伯特蘭·羅素著,田瑞雪譯:《中國問題》,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9年版。
- ⑤ 丁帆:《現代性的延展與中國文論的「當代性」建構》,《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7期,頁145–164+207–208。
- ⑥ 韓慶祥:《中國式現代化的哲學邏輯》,《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7期,頁100–114+206。
- ⑦ 金莉,李鐵主編:《西方文論關鍵字(第2卷)》,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7年版。
- ⑧ 克羅齊著,傅任敢譯:《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 ⑨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
- ⑩ 孫桂榮:《文學研究的當代性與大數據時代的實證學風》,《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頁116–120。
- ⑪ 沈悅,金聖鈞:《中國特色國際傳播敘事的多維轉向與進路優化》,《雲南社會科學》,2023年第6期,頁173–185。
- ⑫ 唐文明:《何謂現代性?》,《哲學研究》,2000年第8期,頁44–50+80。
- ⑬ 王維佳:《全球文明倡議與國際傳播的新境界》,《對外傳播》,2023年第8期,頁16–19。
- ⑭ 楊大春:《現代性的烏托邦與當代性的異托邦》,《現代哲學》,2016年第1期,頁57–65。
- ⑮ 轉引自楊大春:《當代性與空間思維轉向》,《浙江社會科學》,2018年第7期,頁107–113+159。
- ⑯ 江怡:《語言分析與概念分析》,《外國語文》,2011年第27卷第1期,頁54–57。

(Editors: JIANG Qing & Bonnie WANG)